

#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的乡村分异问题\* ——基于传统农村的调查与分析

## Rur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and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Rural Village

陈宏胜 王兴平 李志刚 CHEN Hongsheng, WANG Xingping, LI Zhigang

**摘要** 乡村发展中“乡村分异”问题突出。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打破乡村分异格局、重塑乡村发展活力对乡村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方法对典型农村J村进行调研,发现传统农业型农村中留守居民的家庭收入及主要工作均已实现“非农化”,留守者大多因缺乏外力带动而“留守”,“留守”居民对村庄的满意度低,“留守”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与耕地流转意愿较高不同,宅基地流转意愿较低,宅基地具有超出经济价值的意义。在乡村建设上,精英外流严重制约农村的发展,衍生出集体行动力差、村庄归属感下降等系列问题,加速村庄衰败。尊重农村居民的建设意图及其日常生活实践是扭转“乡村衰落”、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rural differentiation” is prominent i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reak the pattern of rural differentiation and reshape the vitality of rural development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an in-depth interview survey of a typical rural J village are used in this study. We find that the family income and main jobs of left-behind residents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rural areas are all “non-agriculturalized”, and the reason of residents staying is lack of external pull forces. Those residents have low satisfaction with the village, and “staying” is a “helpless choice” for them. Unlike the high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arable land, rural residents have a low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the homestead. Elite outflows have severely constraine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leading to a series of socioeconomic problems. The construction intention of rural residents and their daily life practices are the key to reversing the “decline of rural areas” and realiz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关键词** 乡村分异 | 乡村建设 | 留守居民 | 传统农村 | 乡村振兴

**Keywords** Rural differentiation | Rural construction | Rural staying-behind residents | Traditional countryside | Rural revitalization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18) 05-0087-06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 supr. 20180514

### 作者简介

#### 陈宏胜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副研究员,博士

#### 王兴平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东南大学城乡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

委员会

副秘书长

#### 李志刚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0 引言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形成城市主导的增长模式。农村在城市的扩张或自身的工业化过程中形成各式各样的新形态,如根据城乡距离可将乡村划分为城中村、城边村、城郊村、远郊村等,根据城镇化的程度划分为半城镇化乡村、传统乡村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农村人口比重方面,1978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82.1%,到2013年农

村人口比重已不足50%,且仍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图1)。在农村人口乡村就业比重方面,与农村人口持续下降不同,农村就业人口在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期间实现了高速增长,此后维持在60%左右。在农村就业人口行业分布方面,1978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达92.4%,此后波动性地下降至2013年的62.4%。在农业投资方面,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自1980年后均低于10%,投资主要集中于农业水利基本建设(图2)。这反映出长期以来

\*基金项目:东南大学重大科学研究引导基金“弱势群体与城乡空间公平共享”(编号2242017S30004)资助。

中国农村建设主要以提高农业生产为主,农业生产功能仍是农村的主要国家职能。近年来国家对农村社会建设的投资逐年增加,如农村的住房改造、公路建设、环卫设施增加等,农村生活空间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总体来看,虽然农村经历了人口大规模城镇化(或转出)、农村产业及就业非农化的过程,但农业生产仍是主要国家职能。

在过去30余年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不仅城市发生了剧烈的分异<sup>[1-2]</sup>,农村在传统价值观、社会结构、社会网络、物质空间、村庄景观及经济结构等方面均发生了剧烈的分异。可以认为,在过去30余年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乡村仍处于差异化发展的“乡村分异”时期(图3)。我们认为,“乡村分异”是中国传统乡村体系、结构、文化、组织等在工业化与城镇化冲击下所出现的不断分异与重构的综合过程。如空间上城乡景观的混杂与新农村景观的出现<sup>[3]</sup>,社会结构上基于宗族关系的社会网络被新的经济关系所取代<sup>[4-5]</sup>,在乡村文化上传统礼俗文明为现代商业文化所冲击<sup>[6]</sup>等。以往在以城市为增长极的发展模式下,中国农村呈现相对的衰落景象,特别是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农村情况更为严重。有学者研究提出,当前农村问题与中国实施财政分权、推行城市政府间竞争(“锦标赛”体制<sup>[7]</sup>)紧密相关。这导致地方政府采取城市倾向而漠视农村的经济社会政策<sup>[8]</sup>,使农村发展长期滞后于城市。然而,城市文明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文明的完成,乡村的衰落反而成为制约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找回乡村价值、重建乡村道路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sup>[9]</sup>。从20世纪初到现在,“乡村建设”的重要性依旧未变<sup>[10]</sup>。近10余年来,“三农”政策连续以中央1号文件的形式发布,足以显现乡村之于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自2005年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国家对乡村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新农村”、“新型农村社区”、“美丽乡村”、“美好乡村”等诸多称谓的出现均反映出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对农村发展道路的探索。

在乡村分异的大背景下,并存着“乡村振

兴”与“乡村衰落”2类乡村发展趋势。前者更多地出现在大都市周边农村区域,在城市的需求与支持下重建自身的价值<sup>[11]</sup>,而后者更多地出现在传统农业区域或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社会公共服务短缺、人口外流等使其衰落趋势无法遏制。从成功转型的农村案例来看(如南京江宁、高淳等地的农村),乡村从衰落向复兴的转变不仅是自身结构改变的结果,还依赖于外部力量的推动与注入。其中,与政府投资同样重要的是规划力量的介入。而“乡村规划”中的“规划”却与既有的城市规划范式差异较大,礼俗文化、乡土符号、本土景观、社会网络、情感与归属感、历史记忆等诸多不为既有规划范式所重视的内容反而成为重要的规划元素,因而有学者呼吁将“乡村规划”提升为“乡村建设”<sup>[12]</sup>。乡村需要“规划”是无疑的,我们并不能因为有些地方城市规划所带来的混乱或反作用而否定规划的积极性<sup>[13]</sup>。特别是对于经济衰退、空间衰败、公共服务设施短缺的乡村,规划不仅是空间建设引导的需要,同时也是直面乡村问题、解决乡村问题的重要方法。并且不少乡村的衰落或混乱也可能是乡村规划缺失所导致的,如王兴平等调查发现规划缺位与管理不足使苏南村庄长期处于自发建设而非规划引导的混乱状态<sup>[14]</sup>。另外,为与中国本土乡村实践保持历史一致性并丰富城乡规划体系的内涵<sup>[10, 15]</sup>,本文采用了“乡村建设”的提法。

基于与乡村规划相关的角度,当前乡村建设有5个主要方向。一是强调城市需求的乡村建设<sup>[16]</sup>,即根据乡村所附属的城市需求重新配置乡村要素,主要通过商业开发等方式使其重获经济活力,进而实现人口回流或社群重建,如南京高淳村庄、江宁美丽乡村等示范性乡村,通过适应城市人的田园消费需求,实行观光性特色化种植,使经济活力大幅提升,效果显著(不少乡村已出现家庭回流创业迹象)。二是基于乡村建设主体构建的乡村建设,主体问题主要围绕乡村主体性缺失及乡村建设主体构建两个方面。面对强势的城市蔓延,乡村主体性缺失现象越发明显,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乡

村长期是城市二产、三产转嫁发展成本的“受体”<sup>[17]</sup>。另外,在人口外流、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的背景下,农村建设主体模糊及行动力缺失是制约村庄发展的核心问题。如王伟强等提出中国乡村建设处于政府主导但多元主体并存的状态<sup>[15]</sup>,贺雪峰等学者提出以农业税取消为标志的传统国家力量从农村的退出弱化“村两委”行动力及集体号召力<sup>[18]</sup>,导致乡村建设主体力量缺失,使传统农村长期处于无序发展状态。从规划参与及建筑营造的角度来看,罗辉、赵辰认为村民集体参与才是村庄主体性的体现<sup>[19]</sup>。三是基于乡村土地调整的乡村建设,如赵之枫认为产权明晰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是实现乡村复兴的重要保障<sup>[20]</sup>,合适的土地结构与土地制度是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可避免建设用地侵占耕地的现象<sup>[21]</sup>。四是基于农业经济模式构建的乡村建设,大多数中国农村仍是传统农业型农村,农业仍是其主要支柱产业,农业经济的复苏则是转变其衰退的关键。不过关于农业经济模式的争论仍然不少,如关于资本下乡产生的农地非农化问题<sup>[22-23]</sup>、家庭农场规模问题<sup>[24]</sup>等。五是基于乡村景观塑造的乡村建设,如乡村整体景观意象、景观适宜性、土地利用景观、主题景观和聚落景观等均为乡村规划的重要内容<sup>[25]</sup>。另外,基于乡土文化重建、城乡关系调整等也是乡村建设的重要方向。除了可根据内容进行划分外,当前乡村建设还可根据对乡村本体的认知进行划分,分为“乡村重建”与“乡村延续”两种主张。前者强调乡村是变化的,需在适应当下环境的过程中完成自身的重建,或消失、或异化、或保留,不断地演化就是乡村本体性的体现;后者强调村庄自身历史的延续性,如空间景观的延续、文化的延续、村庄生活原真性的保留等。

通过文献分析可知,既有文献对受城市影响强烈的农村关注较多,对传统农业型农村的关注较少。在规划实践上,对经济理性与景观优化的考虑较多,而对村庄居民意愿与生活实践的考虑较少。然而,乡村建设不同于传统城市规划的重要区别之一是乡村建设主体的确定性,即乡村建设更强调村庄居民的建设意愿及其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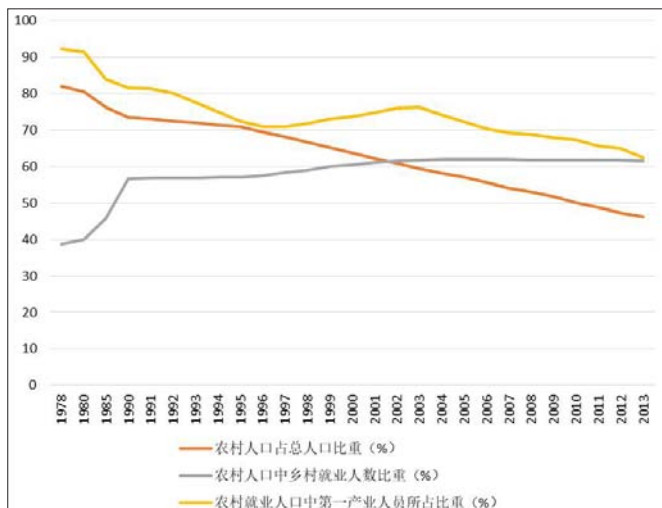


图1 农村人口及农村就业人口比重图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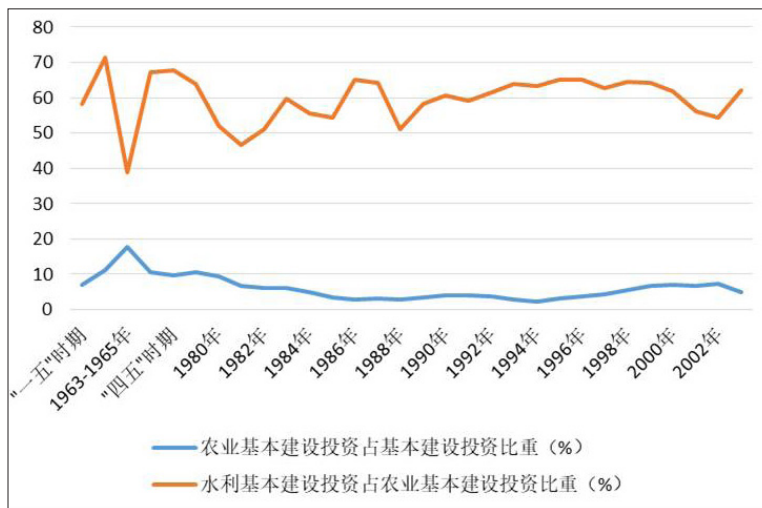


图2 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图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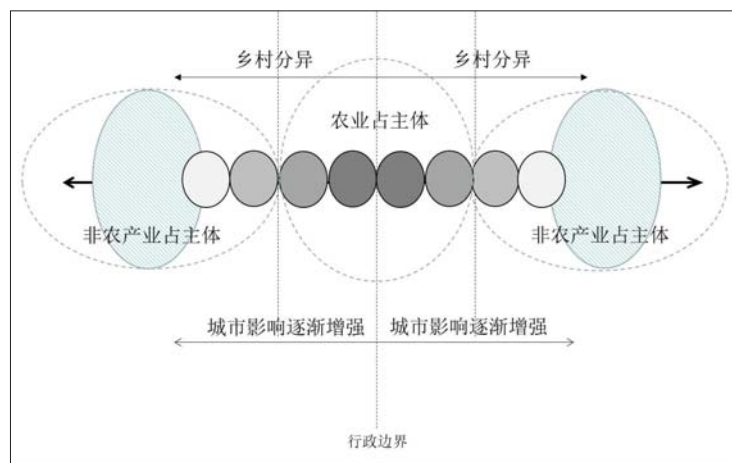


图3 理想化乡村分异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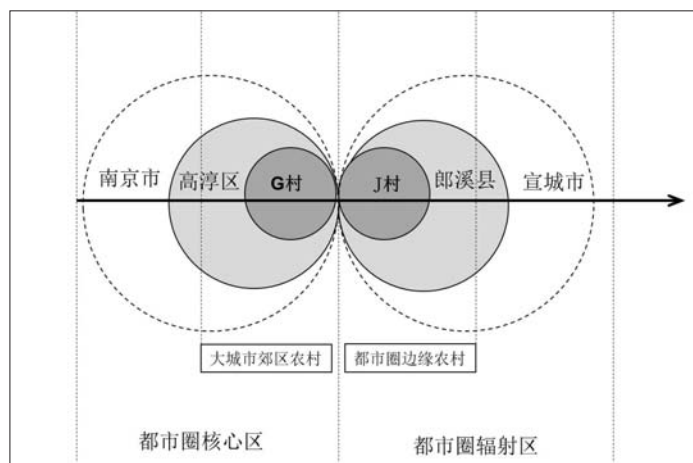


图4 研究村庄区位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常生活实践。且从当前乡村建设实践来看,大城市郊区农村在规划与建设上较易取得“成功”,而传统农村建设缓慢。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选取了南京都市圈外围传统农业型农村为研究对象,从当地留守居民的角度对村庄建设展开分析与探讨。

### 1 乡村分异与研究区域

在城乡关系中,城市始终强势地影响着乡村的演变。离城市越近的乡村受城市的影响越严重,如大城市近郊农村出现的“种房产业”。图3展示的是理想化的乡村空间分异情况,根据城市影响的差异(即“城镇化程度”),乡村

从传统农业区向城市中心区呈现城市影响不断加深的渐变过程。在实际分布上,因城市发展水平、建设模式与经营模式的差异,不同村庄的发展差异极大。

本研究选取传统农业型农村J村为研究对象。J村隶属于宣城市郎溪县,为县城郊区农村,该县紧邻南京市高淳区,处于南京都市圈范围内。J村现辖22个自然村,村域面积9.5 km<sup>2</sup>,总人口约4 100人,共1 100余户。在耕地结构上,J村有耕地333.33 hm<sup>2</sup>,人均约866.67 m<sup>2</sup>,农作物以水稻、小麦为主及一定数量的油菜、烟叶、山场、生态林、苗木等。在区域位置上,因省域行政边界限制,虽紧邻南京高淳区,但郎溪县的发

展远落后于高淳区,两地村庄的建设水平与发展模式亦差距较大。

图4展示了本文案例村庄J村的区位,其中G村为完全不同于J村建设模式的相邻村庄。在田园风光与乡村休闲旅游的消费需求刺激下,通过城市需求导向的乡村建设模式,G村(高淳区下属村)建设与经营水平均高于J村,形成以旅游开发、特色种植与养殖为主的开发模式,而J村则仍为传统农业型农村。G村与J村的发展差异一方面与所在的城市发展水平相关,如地方政府财政投入、乡村规划与建设水平、市场需求等,另一方面也与乡村本底有关,如乡村精英、乡村组织、乡村产业与景观特色等。在人

口结构上, J村外出务工人员约占全村人口的2/3,人口外流现象严重,且流出人口多为乡村精英(如“考上大学”“城里买房”“城里有稳定工作”等),流出人口与村庄的联系较弱<sup>①</sup>。在外出人口长期居留城市、与村庄联系不断减弱的情况下, J村建设主体主要为村庄留守居民。本研究以J村为例,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从“留守者”的角度探讨“乡村分异”背景下传统农村建设问题。本研究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定量部分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及问卷数据分析,其中发放调查问卷120份,回收有效问卷112份,定性部分主要为笔者与村民、村干部等的访谈材料。

## 2 实证研究

### 2.1 J村“留守”居民基本状况

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可知,调研村庄虽为传统农业型农村,但大多数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产业,家庭收入中“农业和非农业约各占一半”的比例为55.4%,以“非农业”为主的占到43.8%。且“留守”居民日常的主要工作以非农业产业为主(占总体的85.7%),这一情况与其收入结构相符合。在受教育水平上,从抽样调研的情况来看,“留守”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总体较低,高中及以下的比例占到总体的80.4%,且“初中及以下”比例超过一半。结合年龄结构来看,受访居民平均年龄为33岁,为村庄的主要劳动力,“留守”居民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可能成为制约村庄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村中社会地位”的自我评价上,认为其家庭在村中社会地位处于中等及偏下的比例占87.5%,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量农村“精英”外出务工的问题。在城乡差别评价上,认为“城乡差别较小”的比例仅为13.4%。城乡差别较大一定程度上说明“留守”农村并不是“城乡一体化”的结果。在留守居民亲戚的城乡分布上,“少部分亲戚”在城镇的占77.7%,大部分亲戚在城镇的仅占2.7%,说明家族中部分家庭迁居城镇的带动作用(或“示范作用”)对农村家庭的城乡选择具有一

表1 各调研村庄居民基本情况

变量	百分比 (%)	变量	百分比 (%)		
性别	男	71.4	家庭收入主要来源	农业	0.9
	女	28.6		农业和非农业约各占一半	55.4
	已婚	84.8		非农业	43.8
婚姻状况	未婚及其他	15.2	年龄	平均值(岁)	33 (18—56岁之间)
	受教育水平	初中及以下		53.6	日常工作
高中及职高		26.8	以非农业为主	85.7	
大专及以上学历		19.6	家庭在村中的社会地位	中上	
城乡差别评价	城乡差别较小	13.4		中等及偏下	87.5
	城乡差别一般	71.4		村庄满意度	满意度高
	城乡差别较大	15.2	满意度低		72.3
城市亲戚	大部分亲戚	2.7	关系较差		14.3
	约一半的亲戚	19.6	村民间关系评价	关系一般	46.4
	少部分亲戚	77.7		关系较好	39.3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定的影响。另外,从农村居民关系评价来看,村中居民间关系较好,既有“乡土关系”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居民的外迁选择。在总体评价上,受访居民对村庄满意度较低,满意度仅为27.7%,这一评价一方面反映出即使在乡村投入有所增加的背景下,传统农村建设仍存在较大的空间,不同乡村获得建设投入的差异较大。即使所处同一片区,不同乡村之间的发展差异巨大,乡村分异的现象明显。另一面,也反映出“留守”农村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或受制于城镇门槛,或受制于个人与家庭条件(表1)。

### 2.2 农村“留守”居民迁居意愿与土地流转意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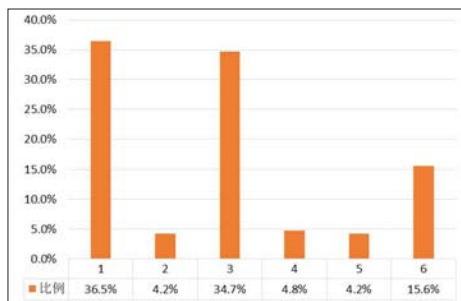
笔者对J村居民居住意愿、土地流转意愿等情况进行调研。在农村居住意愿上,打算长期在农村居住的数量占总体的44.6%,少于打算迁居城市的居民比例。这种情况与当前城乡发展差距较大具有一定的关系。在子女未来发展地的选择上,希望子女迁往城镇发展的比例达到75.9%,可见传统农村“留守”居

民“留守”农村的意愿较低,对农村的预期较低,农村青年劳动力断层危机已现。在调研中,课题组发现不少受访居民认为农村环境熟悉且生活成本低、城镇生活缺乏保障等是支持其“留守”的重要原因。其中,务农收入虽总体上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不高,但土地仍是“留守”居民的重要依靠,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情感上。在土地流转上,82.1%的受访居民认为土地流转对其迁居城镇的影响大。与耕地流转不同,农村居民宅基地流转意愿则相对较低,68.8%的受访居民不同意宅基地流转<sup>②</sup>。其中,“祖上留的基业”(占42.2%)、“补偿太低”(占28.9%)及“担心‘无家可归’”(占14.5%)是主要的影响因素<sup>③</sup>。而对同意宅基地土地流转的居民意愿进行分析发现,“现金补偿”(占51.7%)及“换取城镇住房”(占40.0%)是最受欢迎的流转方式。综上可知,传统农村家庭在农业收入上的比重虽低,但土地仍是支持农村居民“留守”的重要原因,且对于缺乏城镇生活及城镇工作经验的农村家庭而言,农村土地(特别是宅基地)的意义已超出一般的经济价值(表2)。

注释 ①访谈材料1:我们村(J村)年轻人70%以上都在外面打工、做生意,他们是不会回来(工作)的,不过过年还是会回来……留下来的也很少务农,搞搞副业啊、当干部啊(J村村主任邱先生,2015年11月3日)。

②访谈材料2:你看那一家人,全家都在外面,他们家房子都塌了也不重建,他们又不是没钱,就是等村里环境好了,才建呗。村里很多这种情况的,宁愿荒在那里,也不能动(J村下属自然村郝先生1,2015年11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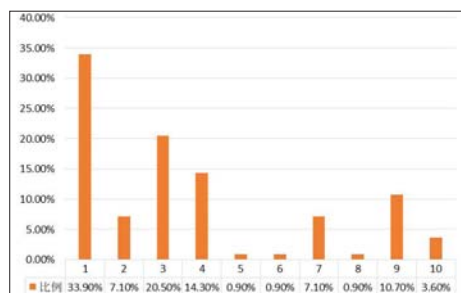
③访谈材料3:我们这条村(自然村)有300多人,70多户,现在村里的耕地基本都流转了,大约还有20多户还在种植吧……村里的耕地都是村内流转的,我流转了300亩,算比较多的了……我主要雇村里的人帮忙耕种,我女儿在市里,她不会回来(帮忙经营)的,我干不动了,就继续流转给别人(J村下属自然村郝先生1,2015年11月5日)。



注:1为“房价太高”;2为“获得城市户口太难”;3为“工作不好找”;4为“邻里陌生”;5为“环境不熟悉”;6为“生活成本太高”。

图5 迁居城市烦恼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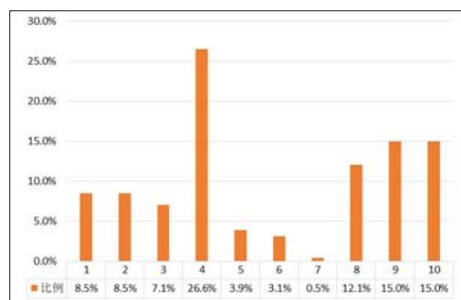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注:1为“家庭收入”;2为“子女教育”;3为“社会保障”;4为“生活环境”;5为“家庭消费”;6为“子女前途”;7为“医疗服务”;8为“信息网络”;9为“文化氛围”;10为“就业环境”。

图6 与城市家庭的差距分布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注:1为“对外交通设施”;2为“内部道路”;3为“房屋”;4为“公共环境”;5为“文化习俗”;6为“就业”;7为“教育”;8为“医疗”;9为“经济活力”;10为“社会保障”。

图7 村庄亟需建设内容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2.3 “留守”居民城乡差距与乡村建设认知

对城乡差距与乡村建设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以下特征。通过对农村“留守”居民迁居城市的担忧进行分析(图5),发现“房价太高”(36.5%)与“工作不好找”(34.7%)是其最主

表2 农村居民居留意愿及土地流转意愿表

变量	意愿	比例 (%)	变量	意愿	比例 (%)
是否打算迁居城市	打算	55.4	是否希望子女未来留农村发展	希望	24.1
	不打算	44.6		不希望	75.9
土地流转对迁居城镇的影响	影响大	82.1	宅基地流转意愿	愿意流转	31.2
	影响小	17.9		不愿意流转	68.8
	转让给村里其他村民	3.3		工作不稳定,担心“无家可归”	14.5
宅基地流转方式	换取社保	3.3	不愿流转宅基地的原因	务农需要	6.0
	现金补偿	51.7	需用于经营副业	8.4	
	换取城镇住房	40.0	补偿太低	28.9	
	换取城镇户籍	1.7	祖上留的基业	42.2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要的担忧,其次为“生活成本太高”(15.6%)。可见,对农村“留守”居民而言,城镇经济门槛是限制其迁居城镇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城乡家庭差距进行分析发现(图6)，“家庭收入”(33.9%)是最为突出的差距,其次为“社会保障”(20.5%)与“生活环境”(14.3%)，“文化氛围”、“医疗服务”、“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内容也较为突出。可见,经济差距与制度差距是传统农村与城镇的主要差距。加快农村经济培育、均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对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意义。对村庄发展提升内容进行分析发现(图7)，“公共环境”(26.6%)、“社会保障”(15.0%)、“经济活力”(15.0%)、“医疗”(12.1%)等都是亟需提升项。在对J村的调研中,我们还发现该区域虽已于2012年完成村庄布点规划,但中心村建设、偏远村庄撤并进展缓慢,乡村规划及村庄撤并的意义受到一定的质疑<sup>④</sup>。

自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国家逐步加大对农村的扶持和投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美丽乡村”“美好乡村”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农村建设速度加快。然而,当前“美丽乡村”建设对城市投入的依赖度高,受所在城市、省份财政状况的直接影响,且特色乡村(如特色旅游资源、特色农产品等)更易于获得试点支持,而大多数传统农业型农村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对J村的调研验证了上述问题<sup>⑤</sup>,传统农村在缺乏特色资源、缺乏特殊区位、缺乏城市资本投入的情况下,面

临持续衰落的危机。另外,当前乡村建设模式单一,应避免简单的村庄撤并与统一建设,注重传统乡村风貌的延续,还应关注村庄公共空间与内在活力和行动力的培育(如归属感、村庄治理能力)。

### 3 结论与讨论

对传统农村J村的调研发现,J村虽为传统农业型农村,但其留守居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及日常工作均已“非农化”,非农产业的发展已成为拉动传统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在农村精英大量外流的背景下,留守居民总体受教育水平低且村内社会地位自评亦较低,“留守者”大多因缺乏外力带动而“留守”,人力资本问题已成为限制传统农村发展的重要环节。另外,“留守”居民对村庄的满意度低,村庄公共环境、公共服务等是重要的制约因素。与村庄满意度较低相似,村民虽选择“留守”,但“留守”的意愿却不高,“留守”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另外,在传统农村、农业发展缓慢的大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意愿高;但与耕地流转意愿相反,农村宅基地流转的意愿较低,宅基地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经济的、情感的及文化的)。

对J村的调研还发现当前村庄布点规划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对撤并意愿、撤并可能、撤并意义的考虑较少。特别是在传统农业区域,乡村建设不仅面临模式单一及资金不足的问题,

注释<sup>④</sup>访谈材料4:我们镇2012年就完成了村庄布点规划,规划为1个中心村和3个基层村,但(自然)村撤并哪有这么容易,别人也不愿意啊……靠自己迁是不行的,主要是没钱,如果政府统一建设还有可能(J村村干部王先生,访谈日期2015年11月4日)。

注释<sup>⑤</sup>访谈材料5:你看我们这个广场、亭子、花园,我们花了40多万去修这些,但是上面只给了我们2万块的建设资金,这怎么够的,要不是我们村里还有个砖厂(改制企业)、林地承包、水塘承包(支持集体收入),我们也搞不起了。村里环境差,外面的人(长期在外的村里人)就不会回来(重)建房子,村里就没人关心(恶性循环)(J村下属自然村郝先生2,访谈日期2015年11月5日)。

简单的村庄撤并与统一建设还加快传统乡村风貌的消失。我们认为,村庄建设应从村庄建设主体的意愿与生活实践上去寻求村庄的发展之路,传统村庄公共空间再造、村庄内在活力和行动力的培育应受到基层政府与规划师的重视(如归属感、村庄治理能力)。此外,在城镇经济门槛与制度门槛较高的背景下,加快农村经济培育、均等化城乡公共服务、缩小城乡差距对提升农村居民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冯健,周一星. 转型期北京社会空间分异重构[J]. 地理学报, 2008, 63 (8): 829-844.  
FENG Jian, ZHOU Yixing. Restructuring of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Beijing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63 (8): 829-844.
- [2] 李志刚,吴缚龙. 转型期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研究[J]. 地理学报, 2006, 61 (2): 199-211.  
LI Zhigang, WU Fulong.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transitional Shanghai[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6, 61 (2): 199-211.
- [3] 朱荣远,张立民,郭旭东. 表情复杂的中国城市化附生物—城中村[J]. 城市规划, 2006, 30 (9): 84-88.  
ZHU Rongyuan, ZHANG Limin, GUO Xudong. Implication from the survey of villages in Shenzhen urban area[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6, 30 (9): 84-88.
- [4] 李志刚,刘晔,陈宏胜.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乡缘社区”:特征、机制与空间性——以广州“湖北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11, 30 (10): 1910-1920.  
LI Zhigang, LIU Ye, CHEN Hongsheng.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 and spatiality of neo-migrants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Hubei village, Guangzhou[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 (10): 1910-1920.
- [5] 李志刚,刘晔. 中国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与空间分异[J]. 地理学报, 2011, 66 (6): 785-795.  
LI Zhigang, LIU Ye. Beyond spatial segregation: neo-migrants and their social networks in Chinese citie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 (6): 785-795.
- [6] 陈波. 二十年来中国农村文化变迁:表征、影响与思考[J]. 中国软科学, 2015 (8): 45-57.  
CHEN Bo. The change of China's rural culture in recent two decades: characterization, influence and reflection[J]. China Soft Science, 2015 (8): 45-57.
- [7] 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 经济研究, 2007 (7): 36-50.  
ZHOU Li'an. Governing China's local officials: an analysis of promotion tournament model[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7 (7): 36-50.
- [8] 马光荣,杨恩艳. 中国式分权,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10(1): 10-24.  
MA Guangrong, YANG Enyan. The Chinese style of decentralization, urban-biased economic policy and urban-rural disparity[J].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2010 (1): 10-24.
- [9] 张尚武. 城镇化与规划体系转型——基于乡村视角的认识[J]. 城市规划学刊, 2013 (6): 19-25.  
ZHANG Shangwu. Urba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planning system: a rural perspective[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3 (6): 19-25.
- [10] 温铁军. 我们还需要乡村建设[J]. 开放时代, 2006 (6): 4-10.  
WEN Tiejun. We still need rural construction[J]. Open Times, 2006 (6): 4-10.
- [11] 张京祥,申明锐,赵晨. 乡村复兴: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下的中国乡村转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4, 29 (5): 1-7.  
ZHANG Jingxiang, SHEN Mingrui, ZHAO Chen. Rural renaissance: rural China transformation under productivism and post-productivism[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4, 29 (5): 1-7.
- [12] 张尚武,刘大威,张佳,等. 乡村规划:特点与难点[J]. 城市规划, 2014, 38 (2): 17-21.  
ZHANG Shangwu, LIU Dawei, ZHANG Jia, et al. Rural planning: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iculties[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4, 38 (2): 17-21.
- [13] 魏立华. 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应澄清的若干问题[J]. 城市规划学刊, 2008 (6): 42-46.  
WEI Lihua. The disputes in the transition of urban planning to public policies[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8 (6): 42-46.
- [14] 王兴平,涂志华,戒一翎. 改革驱动下苏南乡村空间与规划转型初探[J]. 城市规划, 2011, 35 (5): 56-61.  
WANG Xingping, TU Zhihua, RONG Yiling.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pace and planning driven by the reform in southern Jiangsu[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1, 35 (5): 56-61.
- [15] 王伟强,丁国胜. 中国乡村建设实验演变及其特征考察[J]. 城市规划学刊, 2010 (2): 79-85.  
WANG Weiqiang, DING Guosheng. A research on evolution and features of rural development experiment in China[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0 (2): 79-85.
- [16] 赵晨. 要素流动环境的重塑与乡村积极复兴——“国际慢城”高淳县大山村的实证[J]. 城市规划学刊, 2013 (3): 28-35.  
ZHAO Chen. Factor flowing, resource reorganization and rural renaissance: a case study of Dashan village, Gaochun Citaaslow[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3 (3): 28-35.
- [17] 朱霞,周阳月,单卓然. 中国乡村转型与复兴的策略及路径——基于乡村主体性视角[J]. 城市发展研究, 2015, 22 (8): 38-45.  
ZHU Xia, ZHOU Yangyue, SHAN Zhuoran. Study on strategy and path of rural China transformation and renaissance: under the context of rural subjectivity[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5, 22 (8): 38-45.
- [18] 贺雪峰. 地权的逻辑[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HE Xuefeng. The logic of land property right[M].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2010.
- [19] 罗辉,赵辰. 中国南方乡村复兴要点讨论[J]. 建筑学报, 2015 (9): 1-6.  
LUO Hui, ZHAO Chen. Outlining principles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southern Chinese villages[J].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15 (9): 1-6.
- [20] 赵之枫. 城市化加速时期集体土地制度下的乡村规划研究[J]. 规划师, 2013 (4): 99-104.  
ZHAO Zhifeng. Collective land property based countryside planning[J]. Planners, 2013 (4): 99-104.
- [21] 张梦琳,陈利根.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资源配置效应及政策含义[J]. 中国土地科学, 2008, 22 (11): 72-75.  
ZHANG Menglin, CHEN Ligen. Resource allocation effect and policy meanings of transfer of rural collective land for construction[J]. China Land Science, 2008, 22 (11): 72-75.
- [22] 周敏,雷国平,李菁. 资本下乡,产权演化与农地流转冲突[J]. 中国土地科学, 2015, 29 (8): 55-62.  
ZHOU Min, LEI Guoping, LI Jing. Capital inflow in village, property evolution and farmland transfer conflict[J]. China Land Science, 2015, 29 (8): 55-62.
- [23] 沈尤佳. 粮食危机与农业生产方式[J]. 中国农村观察, 2011 (4): 27-34.  
SHEN Youjia. Food crisis and the relation of production in countryside[J]. China Rural Survey, 2011 (4): 27-34.
- [24] 黄宗智.“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J]. 开放时代, 2014 (2): 176-194.  
HUANG Zongzhi. Is “family farms” the way to develop Chinese agriculture?[J]. Open Times, 2014 (2): 176-194.
- [25] 王云才,刘滨谊. 论中国乡村景观及乡村景观规划[J]. 中国园林, 2003 (1): 55-58.  
WANG Yuncai, LIU Binyi. Discussions on rural landscape and rural landscape planning in China[J].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 2003 (1): 55-58.